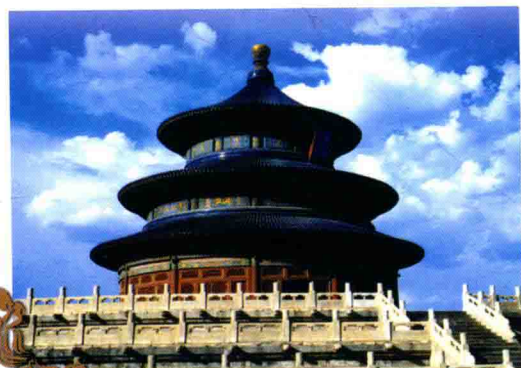


京华梅州人

北京梅州人海外联谊会 编

(下册)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京华梅州人

北京梅州人海外联谊会 编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京華梅州人

京華梅州人編輯部 編纂

出版發行：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號三樓

電話：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傳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三

印刷者：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印數：一三〇〇冊

定價：港幣：六十元

人民幣：五十元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十月

ISBN 978-962-450-038-7/D.53420

编委会成员:

主 任: 周杰民

副 主 任: 林昭奎 陈 拓 许 珍

编 委: 刘裕品 梁鸿光 张贵东 张嘉棠 吴敬希

谢奎蛟 熊 雪 许 珍 张木元 丘桓兴

魏俊生 蔺方智 张 虹

编辑部成员:

主 编: 陈 拓

副 主 编: 丘桓兴 张木元

编辑部成员: 梁鸿光 张洪雁 张 建 杨晓丽 胡卫娜

黄 涛 王 利 王 伟 李 威 高晓辉

姗 晓

办 公 室: 丘丽萍 张 建 李惠芳

目 录

开国将军杨永松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国昌	10
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专家杨运祥	18
夜大学毕业的航天高工罗作昌	23
和超声结缘的人——记中科院声学所高工罗曾义	29
海军潜水与救生专家——罗锐仁	33
监测地震 守护生命——记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罗灼礼	41
大爱济世当伟雄——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罗伟雄	46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罗肇鸿	54
铁兵峥嵘岁月稠——记原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张英	60
从无为到有为的儒商张林华	66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凤铸	71
他用执着谱春秋——记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75
为导弹护航的雷达专家张金海	80
生命因感恩而美丽——记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张登君	85
张洪荣和他的不老人生	91
愿为水利谱华章——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楚汉	97
路在脚下——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协会员 郑荣来	102
脚步不停歇的人——记北京梅州人海外联谊会会长 周杰民	106
心系生态念苍生——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玉环	119

幸福和他的多味人生	124
穿越硝烟的爱恋——记钟耿秋、丘美华的“金婚进行曲”	128
坚守党性诚正为人——记武警北京市总队纪委前专职副书记 钟伯康	143
冶金战线上的财务人生——记原冶金工业部财务司司长 钟礼华	147
另类企业家的另类眼界——钟聪华和他的任务中国	155
钟一锷：情系水木清华	161
心学情寄书香——记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姚梅炎	165
与新中国同行——原北京市侨办副主任黄锦茂纪实	170
原子钟研究专家黄秉英	176
朴实浪花心向海——记马来西亚归侨、军旅作家黄浪华	179
客家女杰黄甘英的无悔人生	185
客家心 台湾情 盼统一 —— 记徐博东教授	194
褪去戎装 育桃李——记高级语文教师曾繁桂	199
火箭技术专家曾源华	203
教书育人的谆谆长者——记原北航党委副书记曾妙南	209
奋斗擎起艳阳天——记清华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曾耀辉	214
海军某部油料专家温新宏	219
大智天真——航天高工彭勇之小记	223
化不开的“农”情——记原农业部审计局局长赖瑞华	231
数学家赖炎连	235
蔡志勇与黑白木刻版画	237
山里走出来的法学家蔡概还	243
乐观人生绣华章——记中国贸促会前驻英国首任首席代表 廖训振	247
于无声处有强音——记我国生物防护情报专家廖应昌	252
“红木大王”廖扬标的艺术人生	257
寻梦京华情筑粤东——记粤东楼总经理魏健东	261

开国将军杨永松

他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将军之一，现已年届九旬，精神依然矍铄。他 11 岁参加革命，12 岁当红军，15 岁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26 岁出席党的“七大”，1955 年授将军衔时年仅 36 岁。

他从广东大埔出发，从一个赤脚的“红小鬼”走进革命队伍，他走过福建，走过江西，走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最后到东北，入北京。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多次对日伪顽的战役、战斗，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可谓身经百战。

他就是杨永松将军。

从放牛娃到“红小鬼”

20 世纪二十年代的广东，孙中山领导下的大革命如火如荼。

1919 年 7 月，杨永松降生在大埔县百侯镇，他是杨家的第四子。杨永松的祖父是小商贩，靠着勤劳，惨淡经营，终于盖起了六间砖泥混合的瓦房，算是小康了。然而由于人多地少，生活终是难以为继，杨永松的二叔三叔四叔和五叔在结婚后，为了生活相继携家眷下了南洋（新加坡）。杨父是长子，以裁缝手艺为生，但在那个年月，人们缺衣少食，肚子都添不饱，哪有钱请人做衣服？因此杨父的生意很难维系，只好改靠贩卖咸鱼咸菜为生。母亲一边带着四个孩子，一边租别人的二亩地，种粮种菜，四季劳作，勉强可以糊口。

杨永松 5 岁时，父亲积劳成疾，因病离世，家中生活更加

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母亲还是咬牙坚持着送杨永松去镇上的步梯小学念书，这是当时唯一能看到的希望和出路。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9月间，一部分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经过百侯，他们的进步思想感染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情绪，这年冬天，百侯镇就成了大埔以东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杨永松的二哥杨鹤松，积极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杨永松受家兄影响及环境熏陶，在学校也加入了童子团，开始了革命的启蒙阶段。1928年3月3日，二哥杨鹤松参与领导了声势浩大的“百侯暴动”，杀死民团团总，给反动势力当头一棒。但因为暴动武装中有军事素养的人很少，在国民党政府派来军队反扑之际，爆动力量只得撤出暂避。杨永松也不得不去替人牧牛为生。

在牧牛的雇主家，9岁的杨永松在担惊受怕中艰难度日。每天，他帮雇主牧放一头大水牛，还要干砍柴的重活。1930年春节后的一个阴雨天，杨永松终于等到了哥哥派人来接他。那时，哥哥杨鹤松已是中共饶和埔县委委员、县赤卫大队长兼政委、埔东区委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杨永松来到革命队伍中，1930年11月，在龙岩召开的闽西儿童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杨永松选入团总部任组织部部长，在张爱萍麾下工作。

一次，杨永松在去南阳区检查工作时，遇到了时任儿童团区团部主任的陈丕显。当时陈看到杨永松的鞋子已经破的不能再穿了，便从区苏维埃找了一双鞋子送给他，因为年龄小，没有合脚的鞋子，杨永松就用一根绳子把大号的鞋绑在脚上穿。他很珍惜这份情谊，不管怎么说，穿鞋走路总比赤脚强。

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让杨永松如沐春风。不过有一件事却让他难过。那是7月的一天，他突然被肃反委员会叫去，以他是反革命的理由将他关押起来，捆绑的绳子深深勒进他手腕的皮肤里，疼的钻心，但我的心更疼。他对要拉他去枪毙的肃反队

人员说：“我才 12 岁，我为参加革命而来，我不是反革命，我从来就没有做过反革命的事！”

两天后，经过调查，他被肃反委员会放了出来。当时眼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回闽西机关，再一个是参加红军。杨永松思考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到前线去当红军！

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1 年，杨永松参加了红军，他被分配在红十二军政治部机关做勤杂及文书工作。被编入红军 101 团。

参加红军不久，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了。红军主力从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返回群众基础较好的江西兴国地区集中。101 团奉命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参加了高兴圩、白石岭战役以及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返回闽西，随军在闽西开展扩大苏区、广东水口战役及返回江西苏区等战役斗争。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藤田整编，接着第五次反“围剿”。一路走来，这时杨永松已调到三团司令部任文书。在东进闽西的路上，他病倒了，每日下午发高烧，那时缺医少药，只得硬扛着，没几日光景，他已是骨瘦如柴，行动都困难了。部队要转移，卫生队用担架抬着他，走在闽赣交界的大山里，山高路陡，行路困难，他躺在担架上十分的内疚，可是又起不来。到了长汀县，杨永松被留在了后方医院，这里依然没有药吃，除了有些粥、饭吃以外，只能靠自身的抵抗力来战胜疾病了。

第五次反“围剿”打得很艰苦。在医院，听说军团已调往江西，而敌人的飞机每日都飞到汀州上空侦察轰炸。福建这边只剩下地方红军，而且也不多了，大家分析估计敌人很快要来了。病员们一致要求转到江西瑞金去。医院终于同意。一日，杨永松等四五十个病号领到了医院发的钱粮，拿着开好的介绍信自己往江西走。经过两日多艰难的行程，来到了瑞金以西的后方总医院。一日后，总院令转九堡医院。好不容易走到九堡，

该医院却是空无一人，估计是已经撤走。又饿又累，大家都是拖着病体，正在无望，这时当地群众走来，有一人提议：“红军同志吃饭无着，我们大家一人领几个到自己家去吃饭。”次日杨永松自告奋勇去总兵站打听回部队的行军路线并领到路上给养，回来向大家传达了总兵站同志的叮嘱：“一定要在4天半之内赶到雩都东南红一军团集结地区，路上万万不能耽搁。”听了此话，大家都感到了敌情严重，知道军队会有大的行动，于是，立即出发。

杨永松和十几位红一军团的伤病员一起上路了，他们按照预定的每日行程赶路，脚磨出了血泡，腿肿起来了，虚弱的身体每挪动一步都异常艰难，但不敢坐下来，怕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就这样，到第五日下午，终于找到了红一军团的队伍，一师的聂鹤亭参谋长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把他留在了师部。这时是1934年的10月。

第二天，得到通知：傍晚出发。当时杨永松还不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就这样开始了。如果没有前些日子拼着性命的追赶部队，或许从此他就与中国革命无缘了。

193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吃过晚饭，就集合出发了，一路夜行晓宿，整整走了六日，到新田，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此后每日赶路，走得很累，但不敢丝毫停下，知道一掉队就很难再跟上了。

就这样紧跟着队伍，一路走一路打，到12月份，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了贵州。

过贵州，入云南，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疯狂，为了与之周旋，红军四渡赤水，二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程比一程难走，一仗比一仗激烈，红军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出神入化的作战方略，击破了敌人的一次次围堵，来到了川康之地的茫茫雪山前。这时，杨永松已调入三团司令部任文书。

杨永松回忆说，那日是由挠喷出发，他所在的三团走在红一军团部之前，二师部队已在前面先行了。当来到雪山下的最

后一个石房子边时，往山上，看不到顶，山顶被云雾遮盖。继续向前，道路拐起弯来，有如盘山公路。此时人人呼吸困难，行走无力。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在山下石屋边大喊：“三团同志努力上啊！要不然今天全军团就过不去了！”由于高山缺氧，大家都像踩在云雾里一样，一步一步地艰难移动。好不容易来到山路边几块巨大的岩石下避风，大家都想坐下休息，可是不一会功夫个个昏昏欲睡。这时候黄永胜团长忽然大喊：“起来走！不能睡！要不大家都会死在这里！”于是继续上山，天地都是一片耀目的白，只有行军踩踏过的脚下是一条弯弯曲曲伸向远方的黑色。在路边的大石头旁，有一些一米多高的灌木丛，前面有七八个掉队的同志实在累的挪不动了，就钻在里边想睡会儿缓口气，结果全冻死在里面了。见此情景，本来也想休息一会儿的杨永松又继续向前挪动着艰难的脚步。

终于走到下山了，可以蹲下来慢慢地滑溜着下山，比上山轻松一些，精神也感觉好多了。一路上，杨永松和战友们还救出了一个掉进雪坑的同志，相互搀扶着，大家下到了山脚。前面出现了溪流、湖泊、森林，再往前，路边出现了“欢迎红一方面军”的标语，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红军的力量又壮大了。

爬过雪山，过康藏区，接上级通知：每个人必需准备半个月的粮食，准备西出草地。波罗子地区艰辛的筹粮后，每人准备了一些炒面、炒麦子，就由毛儿盖出发踏上了艰难草地。

杨永松跟着三团的队伍走在红一军团部的前面。第一日行约 60 华里，在一个松树林里宿营，大家各自捡些小柴禾，在地里挖一个小洞烧火，用自带的饭盒烧水，放进点炒面煮点糊糊就着炒麦子吃，这就算是晚饭了。往后的情况一日比一日更差。第三日，走出丘陵来到了大草地，小灌木林里有许多的红军战士已经长眠于此了。第四日，大家连掩埋战友遗体的力气也没有了。第五日，在一条流水的沟边宿营。半夜时下起了雨，人不能躺，只好坐着，一件短的油布衣，勉强遮住了杨永松的

上身，但大腿以下却泡在雨水里，就这样坐着，从初始的酸痛到渐渐的麻木。第二日天亮，他的双腿肿胀，无法弯曲，站不起身也无法走道了！此时，杨永松用尽全力爬到一个坎子地上坐下来，取出在一次胜仗后买的一双没有补底的袜子，穿上，又拿出一双舍不得穿的新草鞋套上。

部队出发了，杨永松穿着新草鞋新袜子，一根木棍当手杖跟在部队后面一步步往前挪移。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腿部有些发热了，就这样慢慢坚持走了两三个小时，他的脚能感觉到暖和了，再走一阵腿部感到了酸麻，犹如有很多蚂蚁在腿上爬行，逐渐能走得快一些了。这时候他低下头，发现腿部的肿胀已开始消退，又走了几个小时，双腿已可以行动自如了！杨永松非常高兴，他又一次甩脱了死神，往前追赶革命队伍去！

1935年10月，“红小鬼”杨永松紧跟着革命队伍，整整走了一年，走到了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长征结束了。

当年的《战士报》登载：我们的长征经过了11省，行程2万5千里，历尽险山恶水，战胜白军、团匪的围追堵截，大小500余仗无坚不摧。长征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的。正如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杨永松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参加平型关战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面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国共和谈一致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变成特区。8月22日，杨永松所在的一一五师召开誓师大会，统一换戴国民党军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杨永松和大家依依不舍地摘下红五星军帽，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8月23日，六八五团为全师先头团，从驻地出发，一路开赴前线，群众抗日热情高涨，沿途夹道欢迎。此时杨永松任六

八五团政训处技术书记。

到冉庄集结后，杨永松随着队伍翻了一座山，沿着一条河向平型关侧后前进。此时已是9月下旬，塞外秋风凉水，战士们多次涉水过河，异常辛苦。9月23日，我一一五师向日军发起进攻。我军打到公路上，敌人退到对面山上老爷庙和东西跑池村顽抗。日本兵训练有素，个人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枪法很准，我军战士发现日本兵时，往往先被日本兵开枪射杀，大部分同志被击中头部牺牲。后来我军就先用手榴弹向沟里猛炸，然后再下去搜索。杨永松所在团主要力量对付东西跑池的敌人，战斗非常惨烈，我方伤亡很多。24日，被我军昼夜攻击的敌人，乘夜暗向西北蒋军、阎军阵地突围跑掉。

25日打扫战场，杨永松所在六八五团死伤在800人以上，全团只回来900余人，有一个连队只剩下一个副指导员和一个战士，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型关战役，八路军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多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1939年新年过后，马上就要继续挺进敌后去了。这时，杨永松接到了调他到师政治部任秘书的命令，他有些想不通，他是一直希望能下到部队第一线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到职后，师政委罗荣桓找他谈话，罗政委说：秘书工作十分重要，没有经过严格考验的人，不能担任这个工作，新来部队的知识分子，还需要组织考验一段时间。最近，我们要到敌后去，到那时根据工作需要，秘书处工作人员还须增加二三人，希望你新的环境里安心干好工作。

听了罗荣桓这番话，杨永松了解了秘书工作的重要和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他以他一向的真诚朴实回答道：“我人已到职，

首长又专门谈话指教，我一定好好工作。”

1942年10月，上级调杨永松去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这是他参军以来得到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非常珍惜，工作交接后就日夜兼程赶去报到了。可是，刚到党校学习不到半个月，接到了日军要大扫荡的通知，无奈全体学员只好转移暂避。后经一一五师领导和山东分局同意，杨永松又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学习，一路上历尽艰辛在次年8月到达绥德时，又接到驻绥德的中共中央来延干部处理委员会通知：调任绥德抗大总校部秘书科科长，在徐向前校长身边供职。1944年11月，由抗大再起程，杨永松终于来到延安学习，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被介绍到中央党校第二部，分配到第十三支部学习。

1945年4月23日，杨永松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党的“七大”。

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会上大家聚集一堂，气氛欢乐、融洽、亲切。杨永松自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会堂里见到这么多高级干部和领导人，他感到很幸福。

开国将军：走在和煦的春风中

1949年3月，杨永松被分配到第四野战军战车师任政委。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聚集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杨永松的战车师受阅坦克编队，以整齐的队形，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伟大时刻。

1953年1月，杨永松调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54年，华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改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杨永松定居北京。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杨永松被授予少将军衔。大家一起来到礼堂后台，每个人按名字找到预先放在那儿的礼服箱子，打开，将事先已缀好领花、军衔、帽徽的礼服和大沿帽换上。

晚7时30分，授勋仪式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以及元帅、大将在主席台上，与会人员有上千人。杨永松等300多人安排在观众席的中间位置，各自按坐签入座，桌面上放着每人应授予的勋章，毛主席在台上为元帅、大将领勋时，台下上将、中将、少将们自己动手挂上个人的勋章。杨永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手抚着勋章，杨永松泪眼模糊了，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平。

1957年8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杨永松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工程兵任副政委。1968年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

1978年，杨永松退居二线，任北京军区工程兵顾问，继续为国家的军事建设贡献力量。1981年按副兵团级离退休，医疗享受正大区职待遇。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勋章荣誉章。

岁月苍桑，往事渐远。为了缅怀战友，为了给后辈子孙们留下那个年代的记忆，从70岁之后，杨永松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录，他一边回忆，一边思索，一边核对史料，一字一句，他写的很认真。2008年5月，在杨永松将军年届90岁高龄时，一本15万字名为《硝烟往事》的回忆录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与传统教育意义的书，是一部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书。

（张洪雁/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国昌

1984年，马克思故居收藏了两本精装本《〈资本论〉画传》，赠送人是它的编者杨国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2003年，杨国昌来到马克思墓前，在此留影，了结平生夙愿。

沉于书海，刻苦钻研，跨越时空，与先哲对话，这是杨国昌；五十年如一日，追寻着伟人的足迹，倾毕生心血钻研马克思的思想成就，继往开来，这是杨国昌。

踌躇上路

杨国昌出生于梅县雁洋镇太平村。靠侨居马来西亚叔父的经济帮助，艰难地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接着又靠国家的助学金上了大学，念了研究生。

解放前这里是游击区，他大哥就是游击队员，杨国昌很早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高中毕业时，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了考大学，被保送到广州由叶剑英任校长的南方大学政治辅导员训练班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匆匆培训了几个月就担任了梅州中学政治辅导员和初中语文教师。

1953年秋进入华南师范学院政治系，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吴大兰教授的讲解深深地吸引了他，“开始讲商品，从商品引出价值，价值形式的发展产生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又转化为平均利润。……。”一环扣一环，逻辑顺序和历史发展顺序非常清楚，杨国昌被马克思的严密逻辑和辩证思维所折服，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也由于勤奋爱思考受到老师的关注，成为政治经济学科代表。

1955年，杨国昌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从此走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之路。导师对学生要求极严格，入学第一年除了学习俄语，主要时间用来学习《资本论》。导师讲述了自己一本《资本论》，历时十一年又辗转回到自己手中的传奇故事，足见这部书在导师心中的份量。导师的言传身教，对杨国昌产生巨大的影响，决心用毕生精力去钻研这部科学巨著。

1956年，因导师生病，杨国昌被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代培，人大被称为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黄埔军校”，那时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大多是这里培养出来的。

一路风尘

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杨国昌与书籍为伴，与先哲为友，徜徉书海二十年。这是他厚积薄发的二十年。

1957年的整风运动，这是杨国昌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在前期，他还曾单纯地参与其中，到后期思想总结和向党交心时却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起因是，他对自己仰慕的恩师陶大镛教授被划为全国闻名的“右派六教授”之一，感到不理解，产生了同情之心，因而被认为立场有问题。杨国昌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他含泪离开了党组织。由于杨国昌是后期补戴的帽子，被认为情节较轻，行政上免于处分，但由于他所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校领导认为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能继续留在人大学习。他被退回了送培单位北师大，随即又被遣送到北京远郊——百花山莲花庵村，接受群众监督，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他白天和生产队社员一道劳动，晚上帮助生产队为社员记工分，或教青壮年文盲读书写字。质朴的村民，宽厚的老支书，相依为命的老